

從保皇到革命：民國在南洋的足跡與文本 From Conservatism to Revolution: Traces and Tex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陳丁輝*
Teng Phee TAN

一、前言：南洋第一埠頭

新加坡地處季候風之交匯，很早就已成為東南亞的海上交通要道和貿易中心之一。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取得新加坡，宣布此港闊水深的港口為自由港，迅速迎來大批來自馬六甲及區域內其他港口的貿易商，同時也招徠大量來自中國閩粵地區的苦力和商人到此「開埠」。根據1901年的人口統計，當時居住在新加坡的華人移民高達17萬之眾，並且已形成以漳泉、潮州、廣府、海南和客家五大幫群為主的移民社會（Innes 1901; 麥留芳1985: 43-94）。當時，新加坡代表著廣義的「南洋」的概念，而新加坡港則成為「下南洋」的第一埠頭。

當時中國，清廷為回應西方列強的挑戰，被迫辦起洋務以求自強。甲午戰爭之後，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不敵日本的消息震驚海內外，內部要求改革的呼聲高漲，唯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清廷經歷過洋務和變法不果，革命成了民間有志之士追尋中國現代化的不二途徑。清末時期這一系列政治革新的發展，引起海外華人社會的關注。

投稿日期：2021年8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9月16日。

* 陳丁輝，西澳默多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亞洲研究中心歷史學博士，曾任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研究員。目前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首席研究員。

聯絡方式：ttp216@gmail.com。

在這個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中國的保皇派和革命黨人都先後於二十世紀初來到新加坡。當時保皇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人物，他在戊戌政變後7次進出新加坡，向僑民鼓吹保皇思想；革命黨則以孫中山為核心，他前後9次來新宣傳，並在此策劃了3次革命活動。兩人的到來，對新加坡華人社會及本土的政治思潮產生啟蒙作用，特別是孫中山以推翻滿清為目標的革命理念，進一步強化本地社會對中國政治的關注與投入，進而擴大海外華人參與中國政治的可能性。

早年除了王賡武（1981）和顏清煌（1982）兩位學者的研究論及保皇、辛亥革命與新馬華人社會的關係外，相關課題一直到2011年辛亥100週年之際才再度受到注目。隨著紀念活動，研究著述也相繼在本地出版，適時補充這段歷史的空白。¹本文也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簡述康有為的維新變法運動與思想如何傳播到新加坡，以及邱菽園等人如何在本地支持其保皇活動；另一方面，本文也透過孫中山本地支持者的背景、事跡和文本，來探討辛亥革命與新加坡華社的聯繫，藉此重新認識民國創立與海外華人歷史的連結。本文的目的僅在呈現一個歷史的側面，強調南洋華人不僅參與了民國的創建，更在投身祖國政治改造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南洋華人的政治身分與在地關懷，隨著紀念、著述與回憶也將民國的想望和理念托身南洋。隨著南洋的突出，民國的意義也就更為糅雜而豐富。

二、民國在南洋：從保皇到革命

新加坡作為一海外華人移民社會，很早就出現由血緣、地緣和業緣關係組成的會館、社團、寺廟、學校和報章。本地最早的報紙分別是《叻報》（1881）和《星報》（1890），兩者立場皆傾向支持清廷。因此當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戰敗並簽訂《馬關條約》，《叻報》和《星報》均在民族主義的危

1 見廖建裕（Leo Suryadinata 2006）；周兆呈（2011）；陳丁輝主編，張永福著（2012）；陳丁輝主編，林義順著（2015）；陳丁輝主編，陳楚楠追述（2017）。

機意識下發出變法圖強的呼聲。康有為事敗之後，本地反而有更多人同情與支持他在海外的保皇運動，兩報扮演了宣傳的角色。1898年邱菽園創辦《天南新報》，再有一報力挺康有為的政治主張。

戊戌變法失敗，光緒皇帝囚于瀛臺，康有為先後流亡到日本、英國和加拿大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以「忠君愛國」為號召，鼓吹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並在各國成立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1899年10月，康有為自加拿大赴港探望病重的母親，在港期間兩次遇刺，讓他深感生命受到威脅。正是這個時候，邱菽園匯贈千金，力邀康有為到新加坡避難。於是他便於1900年1月27日乘船南下，2月2日抵達新加坡，開啟了他在南洋的流亡歲月。

邱菽園為何支持康有為，要從他的背景說起。1871年邱菽園出生在福建漳州海澄，自小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其父邱篤信年輕時獨自來到新加坡經營米業致富，他遂於8歲時下南洋與父母團聚，至15歲才又返鄉讀書，志在考取功名。他先後考中秀才和舉人，惟科考之路不順遂，從此絕意仕途。但這十年寒窗時期，讓他有機會接觸及觀察到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內憂外患時所迸發出來的改良與變法的新思潮。他非常推崇康有為，也因此成為保皇派的信徒，返新後仍持續關注中國政治的變革。²

根據學者研究，康有為曾於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期間，先後7次赴新（張克宏2006）。清廷懸賞十萬兩要在此間捉拿他，他卻在支持者的庇護下避開朝廷的耳目和記者的追蹤。因此康有為不似孫中山，常駐一個地點為基地，他旅新時居無定所，住過邱菽園的店鋪恒春號三樓的「客雲廬」、邱的寓所「南華樓」、林文慶的住家、章芳林的別墅「茂林園」等，之後又北上馬來亞的檳榔嶼（今檳城）、太平、怡保、吉隆坡等地宣傳保皇思想。

康有為在海外的活動，因得邱菽園鼎力相助，才得以在新加坡建立海外的宣傳中心。學者李元瑾（2001）總結邱菽園對康有為及其維新運動的

2 邱菽園的維新改良思想可以從其著《菽園贅談》感受一二。相關邱菽園思想研究，可參考：李元瑾（2001: 82-84）。

貢獻，主要包括：一、邱菽園創辦《天南新報》，以實際行動支持康的維新運動；二、邱菽園積極在本地籌辦新式學堂，負起章程起草和籌款等工作，並於1899年聯同林文慶和宋旺相創辦新加坡女子學校，力倡女子受教權；三、為回應康有為在中國的興儒之舉，邱菽園在本地倡導儒教復興運動，透過其報章宣傳儒教的重要性；四、他在1899年10月發動南洋各地的500名商眾電祝德宗皇帝「聖躬萬安，早行新政」；五、他於1900年2月襄助康有為自港赴新，使其有安身與活動之所；六、邱菽園也資助康有為策劃1900年8月自立軍在武昌的起義，結果雖以失敗告終，卻也是保皇運動唯一一次起義活動；³最後，邱菽園也協助康有為在新加坡與各地保皇活動的書信往來（李元瑾2011: 275）。

邱菽園是新加坡推動維新、保皇運動的核心之一。經過這一波宣傳，本地華人對中國政治的覺醒也有所提高，促使更多人投身救亡運動之中。但另一方面，革命的聲浪也隨著孫中山的到來得到進一步的開展。

王賡武很早就關注孫中山在新加坡的足跡，過去都以他提出的8次為準，近有本地學者認為實有9次之多。⁴有趣的是，孫中山在1900年第一次來新，目的是為了與康有為會面。⁵這是革命黨和保皇派唯一一次嘗試在新加坡進行交流與合作，然而兩方交流卻生嫌隙，兩股勢力從此分道揚鑣。

孫中山在1905年重返新加坡。此前他在美國看到一份在新加坡發行的《圖

3 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湖南唐才常預計在1900年8月22日發動自立軍起義勤王，因事蹟洩漏遭湖廣總督張之洞鎮壓，造成唐等30名策謀者遇害。起義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康有為不肯將海外籌募得來的款項匯給唐才常，包括邱菽園個人捐助的25萬叻元，造成武器配備及糧食補給不足。

4 杜南發根據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鄧慕韓的《總理所至南洋各地及年月考》、林義順的《星洲同盟會錄》和陳楚楠的《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等史料，確認孫中山先後到訪新加坡共9次。見杜南發：〈孫中山到底來新幾次？〉，收錄在周兆呈（2011: 10-18）。

5 孫中山在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的建議下一起前來新加坡跟康有為見面，共商合作的可能性。宮崎和友人清藤幸七郎先抵新，等待孫中山到來之際，因康有為懷疑他們是清廷派來的刺客，通報英國殖民地官員逮捕兩人。孫中山抵達後，透過友人吳杰模、黃康衢的引荐，請時任立法局議員的林文慶幫忙，兩人才獲釋，不過有關當局也為此驅逐孫中山，限其五年內不得入境，而宮崎和清藤兩人則永久不得入境。有關詳情見宮崎滔天於1902年出版的自傳：宮崎滔天著，陳鵬仁譯（1989）。英國檔案記錄見 *Swettenham to Chamberlain*, 26 July, 1900, in CO 273/257。

南日報》的月分牌，印象極為深刻，專函革命摯友尤烈詢問該報詳情，得悉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等人跟他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在1905年取道歐洲前往日本途中，特地發電報請尤烈安排會面。這是孫中山首次跟南洋的革命同志接觸，也為日後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分會奠定基礎。

孫中山9次到訪新加坡，其中有4次入住張永福的別墅「晚晴園」，並在那裡先後策劃過3次起義，包括：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12月廣西鎮南關起義，以及1908年4月雲南河口之役。張永福和陳楚楠兩人擔任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領導多年，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遺餘力，除了踴躍捐輸，他們也籌措訴訟費營救起義失敗的革命志士、接濟數百名革命軍撤退到新加坡安頓。同盟會成立後，他們透過辦報、書報社、戲劇表演和公開演講，不懈宣傳革命思想。

由此觀之，新加坡在一定程度稱得上是推翻滿清最早的革命策源地、指揮和籌款中心，同時也是革命志士的避難所和庇護所。1908年，孫中山將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提升為南洋支部的總機關，不過在兩年後遷往檳榔嶼，從此海外革命中心北移。

三、星洲三傑在本土：人物、歷史敘事與革命記憶

新加坡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交接之際，華人社會整體上仍傾向支持保皇勢力。1899年，張永福、陳楚楠等78名新加坡華人上書朝廷，公開反對慈禧太后廢黜光緒皇帝之舉。他們也參與邱菽園和林文慶所領導的「好學會」，支持改革運動。但隨著唐才常「自立軍」的覆沒，不少人對保皇派深感失望，轉而支持革命。

張永福、陳楚楠和林義順有「星洲三傑」之稱，他們後來成為了孫中山在新加坡最得力的支持者。張、陳首先受黃乃裳及南來革命黨人尤烈的影響，開始擁護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他們經常在「小桃源俱樂部」議論政治和時局，批判朝廷腐敗無能。1902年，兩人加入教會創辦的「星洲書報社」，以演講的方式宣傳革命。此後，書報社便成為宣傳革命和教育群

眾的重要場所。

民國創建以後，「星洲三傑」均有著作傳世。他們以立足本土的視角，撰寫或彙編了各自參與革命的見聞與經歷，為「民國」在南洋扎根的歷程留下著述。

「星洲三傑」的本土背景、政治認同轉變和歷史敘事，正好可以呈現出新加坡華人社會與「民國」取得聯結的寫照。下文就三人的出身、事跡和文本逐一說明。

（一）張永福與《南洋與創立民國》（1933）

張永福（1872-1959）是新加坡出生的海峽土生華人，祖籍廣東饒平。祖父南來新加坡之初，在眾商雲集的美芝路（Beach Road）開設「新長美」商號從事布匹和香料貿易。⁶1833年，其父張理在新加坡出生，其母陳寶娘則是來自印尼邦加文島（Bangka, Muntok）的土生華人。張永福自幼在密駝路（Middle Road）成長，在家讀私塾，長大後隨父從商，後繼承布莊。1905年，他購置別墅「晚晴園」供母親安享晚年，孫中山到訪新加坡時，其母讓出居所，「晚晴園」因緣際會成為革命基地，將本地歷史與近代中國的革命銜接起來。

1933年，張永福撰寫的《南洋與創立民國》（以下簡稱《南》）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南》書全書有57個小節，共5萬餘字，內容含蓋4個層面：首先是孫中山與本地支持者結交的過程；其次是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的經過；第三是先生在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的情形；第四是革命運動及起義的策劃和執行。張永福所書的時間始於孫中山到新加坡奔走革命的1900年，迄于鎮南關起義的1907年，書中除了他個人的見聞與經歷，也述及許多本地發生的趣聞軼事，令《南》書兼具歷史價值及閱讀趣味。他也在書中附上孫中山遺墨、往來書信、收據賬單、各種檔案照片、圖樣等大量原始材料（陳丁輝主編，張永福著2012）。

6 見宋旺相（Song Ong Siang 1984）著，葉書德譯（1993）。其他有關張永福的生平，見潘醒農編（1950）、畢觀華（1985）。

張永福撰寫《南》書有一個歷史背景：1930年中國國民黨成立的「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職司革命文獻、文物之徵集與典藏，準備開啟民國革命史和國民黨黨史的書寫工程。時馮自由、鄧慕韓等開國元勳亦參與了海外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而張永福負責南洋革命時期史料搜集的部分。大概是受到這種氛圍的影響，他也開始整理相關資料並籌劃其個人的歷史寫作。

張永福對新加坡革命志士所作的貢獻著墨甚詳。他特別指出南洋華僑在黃岡起義、鎮南關之役以及河口起義的付出與犧牲，道出南來和本地支持者如黃乃裳、許雪湫、林受之、余既成等人為革命盡心盡力的事蹟。此外，他對革命黨和保皇派的思想論戰、在香港營救余既成的訴訟案、協助河口起義失敗後600名革命黨人先後撤退到新加坡的經過，以及其後安置他們在中興石山公司的情形都有所述及。他的夫人遵照孫中山指示手繡四款青天白日旗之事，也充分說明新加坡在革命大業上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張永福也詳細地記錄了孫中山在晚晴園的生活起居和習慣。他稱先生性情恬靜、喜讀書、好象棋，生活規律，每日晨起後自理被套，早餐前「先披讀友人遠來之信劄，讀後隨手答覆」，用餐時必「整衣納履」。雖在天氣暑熱的南洋，「亦不隨俗脫去外衣，非至夜深不換睡衣」，睡前洗澡，內衣服日必一換。飲食方面，先生「不喜辛酸苦辣香料異味」，喜歡南洋特產的水果香蕉和鳳梨，但受不了榴槤，「聞之欲嘔，故惡之特甚」。閑暇之余，先生則騎乘「晚晴園」的馬匹外出。張永福的觀察和描述極為細緻，為我們提供了鮮少見諸於其他史料的「孫中山在南洋」的面貌。

《南》書也是張永福為回應胡漢民的《南洋與中國革命》⁷而撰。他雖然謙稱該書是「以平日披集當時存下來的文據，並憑我個人的記憶，東拉西扯

7 胡漢民（1931a, 1931b）口述的《南洋與中國革命》共分為12小節，由張振之記錄，載入他追隨孫中山到南洋地區進行革命的情形。胡漢民（1931a: 1）稱南洋「是本黨革命的策源地，是本黨革命的根據地」，承認南洋在革命史的脈絡中居有極重要的地位，但他在字裡行間常以中國中心角度來看待南洋諸多人事物，立論每有優越。

寫成此篇，以補充胡先生所遺漏」，但《南》書資料之龐雜、細節之豐富、筆觸之細膩，實際上是張永福以立足南洋、心懷本土的視角所撰寫的「新加坡故事」，使「民國」在南洋變得更具體、更有畫面。

（二）陳楚楠與《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1940）

陳楚楠（1884-1971）祖籍福建廈門禾山，本名陳連才。其父陳泰自中國南來，在美芝路創立「合春號」經營木材生意。陳楚楠也是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自幼在家中上私塾，兼學英語和馬來語，年輕時常以筆名「思明州之少年」（馮自由1953）在新加坡保皇派所主持的《天南新報》和香港的《中國日報》發表抨擊清廷的文章。1898年，陳楚楠兄弟共同繼承家業，使他晉身為新加坡華人富商之列。

陳楚楠撰寫《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以下簡稱《晚》）亦有其時空背景。根據新加坡土地局的檔案，張永福於1910年出售「晚晴園」，惟新屋主不擅照拂，任由房子長年荒廢、失修，直到1937年才由李光前、陳延謙、周獻瑞、李俊承、楊吉兆和李振殿等富商合資購回，由南京中央政府匯款15,000元進行修葺。⁸1940年元旦，時駐星洲總領事高凌百主持「晚晴園」重新開幕儀式，陳楚楠被推舉前來報告「晚晴園」與辛亥革命的歷史淵源。⁹《晚》書即為當時的講稿全文，同年由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陳楚楠的演講主要回答幾個問題，包括：本地同志從哪裡受到革命啟蒙？有何行動？孫先生為何在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它又是如何被設立在「晚晴園」？針對他個人革命思想的萌芽，陳楚楠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明。在其成長經驗中，他經常聽到關於遺臣義士亡命南來組織秘密會社反清復明的故事，年少時透過邱菽園的介紹也讀過維新思想的書報，後來因為閱讀上海《蘇報》和鄒容的《革命軍》，他的民族觀念和革命思想就逐漸發展起來。青年陳楚楠經常跟隨張永福等人在其兄陳連敵所設立的「小

8 見臺北國民黨黨史館。1946/11/12。〈晚晴園革命紀念地，周獻瑞老同志談收買經過〉。類別序號：432/2。

9 見星洲日報編。1940/01/04。〈南洋革命策源地晚晴園開幕志盛〉，《星洲日報》。

「桃源俱樂部」議論政治。

1903年「上海蘇報案」發生時，陳楚楠與張永福等人聯名發電報，敦請英國駐上海領事援引保護國事犯條例，拒將鄒容和章太炎交出，成功阻止了清廷引渡二人。各方聲援之下，鄒、章逃過死罪，僅被判監。此事讓海外華人認清了清廷打壓異己無心改革的事實，同時也鼓舞了革命黨人的士氣，首次讓他們感到參與並改變國內政治動向的可能性。「上海蘇報案」加強了陳、張二人參加革命的決心，也讓他們認識到革命宣傳報刊的重要性。

陳楚楠在《晚》書中回憶起當時新加坡的僑社閉塞，聞革命便以為是「叛逆不道，無父無君」的行為，於是他便與張永福合資創辦《圖南日報》，旨在宣傳反清及革命思想，喚醒民衆的政治意識。《圖南日報》在1904年初開始發行，每日印刷千餘份，訂閱者不過30餘人，免費贈閱也乏人問津，連英殖民地政府也在清廷的外交壓力下警告過他們兩人。

儘管如此，保皇黨與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政治版圖，比起數年前孫中山被驅逐出境之時，已稍然發生變化。《圖南日報》的發行量增至二千份，身負與保皇黨論戰之重責。與此同時，他們也翻印了鄒容的《革命軍》，改其名為《圖存篇》，請黃乃裳、林義順等人分批帶回閩南、潮汕、梅州等地分發。

可惜《圖南日報》發行不到兩年就因經費短絀而停刊。陳楚楠旋即集資籌辦《南洋總匯報》，卻因保皇勢力取得股份被迫讓出了經營權。1907年陳楚楠再辦的《中興日報》作為抗衡，由田桐、居正、胡漢民等人輪番撰文，革命派才在對保皇黨的論戰中漸占上風。《中興日報》繼《圖南日報》成為南洋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報刊，唯不敵資金困難，只維持了兩年又停刊了。¹⁰

陳楚楠在《晚》書中也提到「星洲三傑」初次與孫中山會面的情形。1900年，孫當時僅獲准上岸一遊，在「小桃源俱樂部」用餐後便回到船

10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74：432-437, 454-459）。

上。臨行前，孫囑咐陳楚楠物色一名諳熟各種方言的翻譯，預示日後他將在新加坡有所行動。

1905年年底孫中山重返新加坡。他在「晚晴園」安頓之後便召開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會議。當天與會的除了「星洲三傑」，還有在仰光、檳榔嶼兩地從商、熟悉南洋事務又諳熟不同方言的李竹癡。他們四人一同宣誓參加同盟會，之後才有林義順、李曉生等人陸續加入。次年，孫中山攜胡漢民前來起草同盟會會章。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此時有不同方言群的本地支持者共48人。

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底定以後，陳楚楠伴隨孫中山北上芙蓉、吉隆坡、怡保等地設立分會，一場在中國醞釀正熾的革命運動就此跟新馬華人社群連結起來。1907年5月，他們為黃岡起義籌得三萬叻幣的經費；同年的鎮南關起義和隔年發動的河口起義，皆在「晚晴園」策畫。每有同志因起義失敗流亡至新加坡，他們也負起接濟、安頓之責。因此，陳楚楠非常強調本地支持者的貢獻，不僅出錢出力，還親自投身革命的行動。

（三）林義順的《星洲同盟會錄》（1928）

林義順（1879-1936）祖籍廣東澄海，祖父亦在美芝路經營綢緞布匹生意起家，其父林炳源，其母張春蓮，為張永福的姐妹。林義順字蔚和，書名其華，別名發初。他四歲喪母，八歲喪父，自幼由外祖母陳寶娘撫養長大，早年在家上私塾，其後到教會學校聖若瑟書院（今新加坡美術館的前身）及英華學校完成學業，具備中英雙語能力。林義順的政治啟蒙可以說是源自舅舅張永福及好友陳楚楠，三人自年少起就非常關心中國時政。

林義順事業有成，在新加坡北部開闢了二萬多英畝的土地種植橡膠和黃梨，享有橡膠大王和黃梨大王美譽。他曾出任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鄉村局委員，獲頒太平局紳，同時也先後兩次出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會長、怡和軒俱樂部及潮州八邑會館的總理，是本地華社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另一方面，林義順也曾多次出掌中華民國政府各部會顧問要職，包括於1917年擔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府參議及北京農商部咨議官、1919年出

任粵軍總司令部顧問、1920年出任廣東省公署高等顧問及中國銀行名譽顧問、1922年擔任北京總統府顧問、1923年出任北京農商部顧問、1928年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名譽顧問、1929年受委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名譽採訪等等職務。1936年，林義順病逝上海，享年57歲。

林義順的《星洲同盟會錄》（以下簡稱《星》）嚴格來說算不上著述而是一本文獻彙編。1928年9月，林義順將其蒐集和翻拍的剪報、照片、手跡等有關中國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分會的原始材料彙整、裝訂成冊，寄贈給廈門大學惠存。目前所知，該燙金鉛字的精裝冊是今廈門大學圖書館的珍藏本，亦是孤本。

林義順雖是張永福的外甥，但他比舅舅還要更早意識到為本地留下一手史料的重要性。《星》書篇幅極短，全冊僅有40頁，內容可概括為4類，均張貼在「林義順公司」的信箋上：其一為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史料手稿，內容包括其成立及活動簡說、會員、通譯及捐助人名錄等；其二為活動照片，其中有孫中山與南洋同志在晚晴園留影、星洲書報社建築、義士之墓、孫中山謁明太祖陵及孫文墨寶等等；其三是重要剪報的翻拍照，包含《中興日報》丁未年七月十二日第一號、《中興日報》刊登的孫中山與汪精衛等人提倡革命論稿、胡漢民與汪精衛的演說詞、保皇派《天南新報》戊戌年四月初八日第二號、《南洋總匯新報》反對革命主張之言論等；最後是名人墨寶、贈詩、委任狀及時人往來書信等文獻的翻拍照片。

《星》書內容看似雜亂無章，缺乏歷史敘事，像是沒有章程、信手張貼的記錄與收集。實際上林義順另有規劃，他生前擬訂撰寫回憶錄《三十三年浮雲影》，已邀陳少白寫序，唯未及付梓出版，他便於1936年因病在上海驟逝。因此在新加坡的本土意義上，《星》書之可貴，在於它是林義順唯一傳世的文本。

2015年，「晚晴園」取得廈門大學圖書館授權《星》書電子版的使用權，隨即將它與林義順相關的其他史料文章一併重編印刷。新編《星》書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乃重印《星洲同盟會錄》、1921年上海實業名人集傳總編輯所出版之《林義順傳》、潘醒農撰〈林義順先生傳〉以及邵

蒂甘棠述〈林義順先生在滬逝世經過〉等四份原始文獻；第二部分則收錄多篇林義順相關主題的文章、報導和紀錄片製作感想，試圖以不同領域工作者的視角和觀點，管窺林義順其人的歷史樣貌，也為近代中國海外華人史聊作補充（陳丁輝主編，林義順著2015）。

四、結論

新加坡自1819年英國人「開埠」以來，經過約半世紀的歲月，逐漸形成一個由中國華南籍人口組成的移民社會。隨著清廷積弱，中國救亡刻不容緩，新加坡這個自由貿易港口遂成為各股勢力爭取海外支持的場域。

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對新加坡華社的意義可以從政治和文化兩個層面來談。首先在政治上，是改革力量匯聚在新加坡。1900年以來，試圖在體制內變法維新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滿清廢除帝制的革命黨，都不約而同來到新加坡宣傳各自的救亡思想。此後十年間，他們以新加坡為「南洋」最重要的根據地，尋求海外資金和民氣的支持。

換句話說，過去被朝廷視為「棄民」的華南移民，因康有為和孫中山的政治競逐向海外延伸，而使他們意外登上這個歷史舞臺。此前海外華人移民社會跟中國的政治沒有連結。一般海外華人社會都由少數商人和大批苦力組成，他們的共同目標在謀生和賺錢，以期有朝一日衣錦還鄉、落葉歸根，對中國的政治很感疏離，也不關心。但隨著保皇和革命兩派人馬的到來，競相爭取他們的支持，這才讓本地華社首度意識到原來他們也可以投入個人的力量來參與國內的政治，同時也體認到他們作為「海外華人」這個群體的存在。這是在過去海外移民歷史進程中，未曾有過的現象。

這給本地華人社會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海外華人」亦能在保皇派或革命派的號召下，把自己跟中國的關係重新連結起來，而且實力不容小覷。康有為在此籌募經費、宣傳保皇，他的支持者辦報、辦學，保皇派勢力在論戰上也一度佔據上風；孫中山在此成立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

也透過辦報和演講來宣傳，讓不同階層人士都有機會思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並且認識到個人的參與亦有可能起到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新加坡作為「南洋」一隅的邊陲位置，因先後有康有為和孫中山的政治角力，得以一躍成為區域間推動國內政治的中心；而後新加坡成為孫中山的革命基地，也喚起了本地華人的政治意識與熱情，讓「民國」的概念得以向海外延伸和擴張，逐漸在「南洋」扎根。

第二，在文化上，「南洋」相對於中國而言，是南方以南，比邊陲更邊緣的域外。然而隨著維新變法的口號，新式學堂、女子學校、孔教復興運動等等實際建設，都在在地衝擊著本地華人社會及文化界。革命派則擅長論戰，胡漢民、汪精衛、田桐、陶成章、居正等人先後坐陣本地報章，大大地提昇了華社對中國政治思想與發展的認識，同時也產生不小的衝擊。我們可以這麼說，保皇和革命兩派的競賽，對本地教育的建設有不可抹煞的貢獻，也產生了提升本地文化水平的作用，而他們透過現代教育和發行報章所推動的政治與文化活動，也進一步強化了「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

從結果來看，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讓新加坡華人社會經歷了一次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也牽動了海外華人「再中國化」的民族主義情感。這個過程一經啟動便持續作用，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後的共和、討袁、北伐、抗戰、國共鬥爭等後續的政治發展中，新加坡華社均有所回應。這種認同和情感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後，新加坡從自治過渡到獨立，華人的政治認同才逐漸轉向本土，形成新的國家意識。

回到「星洲三傑」的文本來看，三人講的是同一個歷史敘事：新加坡的故事和記憶。就書名看，他們分別從「星洲」、「南洋」和「晚晴園」的視角和立場來回望辛亥革命的歷史。前二者是地域的概念，後者則是建築地標，三者均立足海外。張永福、陳楚楠和林義順站在中國的南方以南的敘事位置，來訴說他們所參與的近代中國革命歷程。更具體地說，三人講的是「新加坡版」的辛亥革命史。他們以新加坡為主體，從立足之所在出發，來回顧海外華人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貢獻。

「星洲三傑」的革命記憶與歷史敘事充分地再現了新加坡本土的人、事和物，如何捲入中國這股革命的浪潮。雖然他們當時關心的是中國的命運與存亡，但在參與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吸收經驗，在挫敗和教訓中反省、調整，成功之後分享成就和果實。藉由這樣的累積，南洋華社在往後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中，愈發茁壯。正是這種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和考驗，讓本地華人憑藉自身的政治智慧，試圖開創另一個屬於自己的共和國。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Miyazaki Toten (宮崎滔天) 著，陳鵬仁 (Chen, Peng-Ren) 譯。1989。《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 *Sanshisannian zhi meng: gongqitaotian* [Thirty-three Years of Dream: Miyazaki Toten]。臺北 (Taipei)：水牛出版社 (Buffalo Book)。
- Song, Ong Siang (宋旺相) 著，葉書德 (Ye, Shu-De) 譯。1993 (1984)。《新加坡華人百年史》 *Xinjiapo huaren bainian shi*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新加坡 (Singapore)：中華總商會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Party History Committe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編。1974。《中國同盟會革命史料 (一)》 (革命文獻第六十五輯) *Zhongguo tongmenghui geming shiliao yi geming wenxian di liushiwu ji*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eague I (Revolutionary Documents Series 65)]。臺北 (Taipei)：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Party History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 李元瑾 (Lee, Guan Kin)。2001。《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分子的三種回應：邱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的比較研究》 *Dongxi wenhua de zhuangji yu xinhua zhishi fenzi de sanzong huiying: Qiu shuyuan Lin wenqing Song wangxiang de bijiaoyanjiu* [Responding To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Singapo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hoo Seok Wan, Lim Boon Keng And Song Ong Siang]。紐約 (New York)：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新加坡 (Singapore)：國立大學中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US) 聯合出版。
- 。2011。〈邱菽園與辛亥革命〉 “Qiu shuyuan yu xinhai geming” [Khoo Seok Wa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 (Hawaii huaqiao yu xinhai geming guoji xueshu yantaohui)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中國海外交流協會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主辦, 暨南大學 (Jinan University)、華僑大學 (Huaqiao University) 承辦, 2011/08/22。

周兆呈 (Zhou, Zao-Cheng)。2011。《百年辛亥南洋回眸》*Bainian xinhai nanyang huimou*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the South China Sea]。新加坡 (Singapore) : 八方 (Global Publishing)。

胡漢民 (Hu, Han-Min)。1931a。〈南洋與中國革命〉“Nanyang yu zhongguo geming”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新亞細亞》*Xin yaxiya* [New Asia] 第1卷第5期, 頁1-11。

——。1931b。〈南洋與中國革命 (續)〉“Nanyang yu zhongguo geming xu”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tinued)], 《新亞細亞》*Xin yaxiya* [New Asia] 第1卷第6期, 頁3-12。

畢觀華 (Bi, Guan-Hua)。1985。〈張永福傳〉“Zhang Yongfu zhuan” [Biography of Zhang Yongfu], 《怡和軒90周年紀念特刊 (1895-1985)》*Yihe xuan jiushi zhounian jinian tekan (1895-1985)* [Yihe Xuan 90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1895-1985)], 黃溢年 (Huang, Yi-Nian) 主編, 頁101-104。新加坡 (Singapore) : 大水牛出版 (Big Buffalo Press)。

陳丁輝 (Tan, Teng Phee) 主編, 林義順 (Lin, Yi-Shun) 著。2015。《星洲同盟會錄》*Xingzhou tongmeng huilu* [Sin Chew League Club Record]。新加坡 (Singapore) : 晚晴園 (Sun Yat-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陳丁輝 (Tan, Teng Phee) 主編, 陳楚楠 (Chen, Chu-Nan) 追述。2017。《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Wanqingyuan yu zhongguo geming shilue* [Sun Yat-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and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新加坡 (Singapore) : 晚晴園 (Sun Yat-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陳丁輝 (Tan, Teng Phee) 主編, 張永福 (Zhang, Yong-Fu) 著。2012。《南洋與創立民國》*Nanyang yu chuanglei minguo*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新加坡 (Singapore) : 晚晴園 (Sun Yat-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麥留芳 (Mak, Lau-Fong)。1985。《方言群認同: 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Fangyan qun rentong: zaoqi xingma huaren de fenlei fazhe* [Dialect Group Identity: Early Classification Rules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臺北 (Taipei)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張克宏 (Zhang, Ke-Hong)。2006。《亡命天南的歲月: 康有為在新馬》*Wangming tiannan de suiyue: Kang Youwei zai xinma* [The years of desperate days: Kang Youwei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吉隆坡 (Kuala Lumpur) : 華社資料

研究中心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馮自由 (Fen, Zi-You)。1953。〈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Nanyang gemingdang diyiren: Chen Chunan”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Nanyang Revolutionary Party: Chen Chunan]，〈《革命逸史》第三冊 *Geming yishi di san ce* [Revolutionary History III]〉，頁183-189。臺北 (Taipei)：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潘醒農 (Phua, Chye Long) 編。1950。〈張永福傳〉“Zhang Yongfu zhuan” [Biography of Zhang Yongfu]，〈《馬來亞潮僑通鑒》 *Malaiya chaoqiao tongjian* [The Teo-chews in Malaya]〉，頁158。新加坡 (Singapore)：南島出版社 (South Island Press)。

顏清煌 (Yan, Qing-Huang)。1982。〈《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 *Xingma huaren he xinbai geming*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臺北 (Taipei)：聯經 (Linking)。

二、外文書目

Innes, JR. 1901. *Report on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aken on the First of March 190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Press.

Leo, Suryadinata ed. 2006. *Tong Meng Hui, 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Revisit*.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Song, Ong Siang. 1984.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ng, Gungwu. 1981.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pp. 130-139.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